

子家駒教育文選

家駒自署



千家驹教育文选

人民教育出版社

千家驹教育文选

千家驹 著

*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装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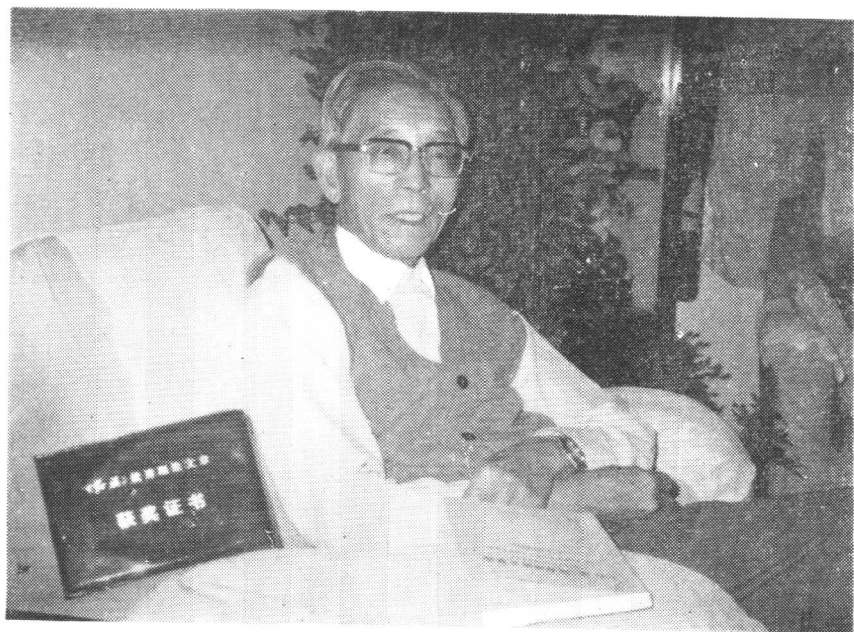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4.625 插页1 字数114,000

1987年10月第1版 1988年 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3,600

ISBN 7-107-10121-8

G·832 定价 1.35 元



千家驹近影

序 言

近几年来，我写了好几篇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引起了社会上的共鸣。我是研究经济的，并不懂教育。谈论教育问题的经过是这样的：在1979年的中国财政学会的学术讨论会上，我批评中国的教育经费太少，占国家预算和国民收入的比重都远远低于世界其他国家，回到北京以后，《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我，要我把这个意见写出来，我就写了一篇《搞四化必须大量增加教育经费》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1980年3月15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以后我又在《教育研究》上写了一篇题为《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的论文，我把这篇文章寄给陈云同志看，并给他写了一封信。陈云同志看后将我的信和文章转给中央领导同志，并认为我“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十分重要的，是很有远见的”，要有关部门“加以研究，提出方案，然后在书记处会议上专门讨论一次”。此外，我还在全国政协大会以及其他一些学术报告会上——再呼吁应该重视智力投资，大量增加教育经费，引起了社会人士的关注。

1983年，我应《红旗》杂志之约，为该刊写了一篇题为《重视知识一定要重视教育》的论文，（见1983年第8期《红旗》）这篇文章被评为《红旗》五年来最优秀的论文之一，（共评选出20篇，拙文为其中之一）可见教育问题已引起全国一致的重视。

对高等教育的改革，我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1980年，我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改革大学教育体制的一点意见》（见该报1980年6月12日）。1983年，我去广州讲学，正值广州筹

备恢复广州大学，叶选平市长聘我为广州大学名誉校长。回到北京以后，我就如何办好广州大学给广州市领导许士杰、叶选平等同志写了一封信，陈述我的意见，这封信后来摘要发表在1983年10月28日的《羊城晚报》上，我的意见至今仍被广州大学领导所重视。

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是我若干年来一贯所主张的。经过了许多同志的努力，我国终于在1982年公布的新宪法里明文规定我国要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1986年又通过了《义务教育法》。虽然我国义务教育法的颁布，比许多先进国家几乎整整迟了一百年，但晚颁布总比不颁布好。不过《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并不等于义务教育的贯彻已经有了保障。对于如何贯彻执行义务教育法，至今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我在1983年中国民主同盟主办的学习新宪法讲座中，曾经做了一次关于义务教育与智力投资的报告。又在1986年的六届全国政协五次大会上提出应大量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把可行性研究未经充分科学论证的巨大工程停下来，将经费移用于兴办义务教育。这次政协大会发言受到到会委员的热烈反响。

由于近几年来我一再呼吁要重视智力投资，要把教育这百年大计放在首要地位，虽然受到了一些领导同志的重视，但也遭到一些同志的批评。在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出版的《计划经济研究》上，柳随年、王泓、魏礼群三位同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也不能由国家包下来》，这是针对我的《财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一文而说的，因此我又写了一篇《再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来答复他们。现在我把柳随年等同志的论文作为本书的附录。

这几年来，我还在各地作学术报告或答记者问，大声疾呼要重视教育这个百年大计的问题。我也选了几篇报纸上的报道文章作为附录。

千家驹

1987年9月1日

目 录

序言	(1)
搞“四化”必须大量增加教育经费	(1)
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	
——论普及初等教育问题	(6)
为普及教育问题给陈云同志的一封信	(16)
财政支出应首先保证智力投资	(20)
要把增加教育经费作为实现“四化”的重要战略措施	(31)
教育应该走在经济建设的前面	(44)
重视知识一定要重视教育	(49)
应该十分重视智力开发	(57)
关于改革大学教育体制的一点意见	(68)
就如何办好广州大学给广州市领导的一封信	(73)
贯彻新宪法 普及义务教育	(76)
再论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92)
从校舍倒塌说到义务教育	(98)
怎样才能提高小学教师的地位	(102)
再谈必须重视小学教育	(106)
关于义务教育问题在全国政协大会上的发言	(113)
关于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再认识问题	(118)
关于加强职业道德教育问题	(124)

附录:

普及初等义务教育也不能由国家包下来

.....柳随年 王泓 魏礼群 (127)

发展教育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

——访千家驹教授.....高凤仪 (134)

教育是最基本的基本建设，教育必须先行

.....斐志鸣 (137)

千家驹谈人才引进和智力投资问题

.....章列兵 邓小惠 (140)

搞“四化”必须大量增加教育经费

(1980年3月15日)

前些时候，我有机会去外地参观一下，回来以后，又看了一些有关文教方面的资料，感到有一种情况深值我们的注意。就是我国一般的文教科人员的工资待遇，要比一般工人或营业员平均低15—20元左右。因为他们没有奖金，没有附加工资，没有其他福利。这里，我决不是说，工人的待遇太高了，而是说对比起来，文教科人员的待遇实在太低了。这一问题，在中小学教师中特别突出。有个公社的书记对一个小学教师说：“你好好干，将来我提拔你当一个营业员”。可见，在有些人心目中，教师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都远不及一个普通工人或营业员。

由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最近几年有大批教师和科研人员被提升了。这是一件好事。但是提职不提级，大部分被提升人员的工资低于他们应有的职务级别。在学校中，职务已提升为副教授而工资待遇仍拿讲师或助教的颇不乏人。这不符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他们对国家的贡献与他们所得的报酬是脱节的。

所以发生文教科人员待遇低，房子挤，工作条件差，原因当然很多，有的也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例如住房问题）。但文教事业经费不足，总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国教育经费在国家总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之低，在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

是倒数第十名，象埃及，人口只有 4000 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实在是很不相称的。

为什么教育事业经费那么少，这除了受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以外，还由于许多人思想上不重视文化教育事业，长期以来，没有把教育摆在应有的地位。实现四个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但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把教育当成基础看待。有人甚至把教育当成“软指标”，有钱多给点，钱少少给点，没有钱就不给。因为一个工厂如果关了厂或减了产，其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产品不见了，上缴利润没有了，立刻会引起人们的重视。而教育的发展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教学质量下降，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才会显示它的严重后果来。整个民族文化水平降低，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在短时期内是不容易看出来的，但其后果却比一些工厂停工停产严重得多。

有人认为文教科研是消费部门而不是生产单位，消费部门少给几个钱算什么？他们不懂得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年代里，劳动力的再生产要依靠教育，把科学技术的成果转移到生产过程中去也要依靠教育。目前教育已经作为潜在的生产力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所以先进工业国家就提出了“人才开发”的新的教育观点，或者叫做“人的能力”的开发。大力开发人的能力就象开发其他资源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而“人的能力”的开发则有待于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在许多国家里，把人的能力的开发也当作一种投资，而且是比单纯地增加物的资本更为有效的投资。所以一些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无不对教育事业特别重视。

教育与经济是密切相关的，这本来是一个常识问题。教育事业受国民经济发展的制约，反过来又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一般说来，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经费的增长应成正比例的增加。两者之间应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从

1965年到1974年，美国教育经费支出由370亿美元增加到913亿美元，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5.3%上升为6.6%，按1972年美元价值计算，教育费用增长41%，而同期国民生产总值仅增长32%。这说明美国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还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日本从50年代到70年代这20年中，教育经费增加了十倍。例如1971年教育经费占国家总预算支出的39.16%，占当年世界第一位。

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非但没有增加，反而相对地减少了。在1950年—1965年约占工农业总产值1.37%，在1966年—1976年减为只占1.1%；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1978年）虽略有回升，亦仅占1.12%，是很不成比例的。我国建国以来，教育经费与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一直存在着矛盾，尤以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为显著。从1966年—1976年11年中，中学学生增加了五倍以上，而中学经费只增加1.58倍。小学学生增加一倍以上，而小学经费只增加64.68%。

由于我们不重视教育以及教育经费相对地减少，首先使教学质量降低。据天津市调查，1966年以前中学教师有74%是大学毕业生，现已下降到39%。高中毕业教高中，初中毕业教初中决不是个别的现象。去年天津市对某一中学高中二年级学生进行复习以前的知识摸底测验，一部分学生只达到小学四年级的文化水平。当然，目前中小学生的文化水平比“四人帮”横行时期是提高得多了，但是与1966年以前相比，显然是降低了。

其次是由于小学教育没有普及，青壮年的文盲、半文盲的人数增加了。50年代我们曾进行过大规模的扫盲工作，20多年过去了，旧文盲没有扫清，新文盲又出现了。据说，四川省就有文盲、半文盲1200万人。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文盲的比例更大，有的高达人口总数70%到80%左右。在一个文盲很多的国家，要实现“四化”是很难想象的。

其三是学校设备差，校舍不足。据 23 个省、市、自治区的调查，1978 年中小学校舍中有倒塌危险的房屋，占校舍总面积 17.2%，每年都有危房倒塌伤人事故。中小学校舍中“土房子”，“黑屋子”的现象相当普遍，据西安市调查，缺少门窗的黑屋子就占全市中、小学校舍的 22%。大多数的中小学，没有起码的教学演示教具和仪器设备，更谈不上分组实验设备了。许多中学不能按照教学计划开出理化、生物课所规定的实验。图书，体育器材，以至课桌板凳也很缺乏。中小学是大学的基础，中小学的质量差，又怎么能培养出“四化”的人才来呢！

为了解决中小学的经费不足，教师待遇过低的问题，有人提出学校自己搞点“生财之道”。有的学校把课堂晚上用来当旅馆，把操场当存车场，学生去拣废品卖等等，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头的，这决不是我们办教育的方向。一个学校为了有利于使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办点与教学有关的实习工厂、农场、林场等等，那当然是可以的。但不能单纯为了钱，为了搞点“外快”，去这样搞“生财之道”。

我们非要大量增加教育经费不可。当前财政有困难，难以一下子解决，但无论如何要大大增加教育经费的比例。我们知道，我国基本建设的投资，浪费是很惊人的，这里我指的不是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失调问题，而是说由于我们不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瞎指挥，以及思想上的“吃大锅饭”所造成的种种浪费，只要我们有些领导不自以为是，注意听取和尊重专家们的意见，提高责任心，改进工作，减少一些这种浪费，用来补助中小学教育经费，就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以及国家总预算中，教育经费应占多大的比重，应有一定的比例关系。我国教育经费的比例实在低得不成样子，这也是一种比例失调，这种比例失调的后果，其严重性决不下于其他的经济上的比例失调。

当然，我不是说，教育经费增加，教学质量问题便可以解决了。要提高教学质量，还有师资、教材、设备……一连串的问题，还有人浮于事，非教学人员过多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单靠增加教育经费是不行的。但无论如何，经费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

曾记得在 50 年代，马寅初先生提出了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但在当时未被人们所重视，结果闹得中国今天有九亿多人口，给我们的经济工作增加了多大的困难。如果我们在 20 年前便重视计划生育，控制人口的增长，今天我们的日子便好过得多了。中小学的教育问题，也有类乎此。如果今天还不引起人们的重视，听其这样下去，它对我们整个民族文化、科技水平的提高，对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将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等到那时候，我们要图补救，也就悔之莫及了。

原载 1980 年 3 月 15 日《人民日报》

把智力投资放在第一位

——论普及初等教育问题

(1982年11月1日)

一

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指出：“普及教育是建设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前提，关于这一点，党中央和国务院在1980年就已经作出决定：全国要在1990年以前以多种形式基本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经济比较发达、教育基础较好的地区，要争取提早实现。”可见党中央十分重视普及初等教育的，而且早已决定要在1990年以前基本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本来，实现四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尤其初等教育是基础的基础。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也不能设想，一个缺少文化，缺少起码历史知识的国民能够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世界各国无数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生产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不仅要靠生产建设投资的不断增加，而更重要的还要靠生产劳动者的思想觉悟与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这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做到。因此，必须把培养人才，发展教育事业，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抓。各国都把投放教育事业的经费作为一种“开发智力的投资”。他们认为，开发智力

投资的效果虽不象工农业投资那么立竿见影，但从长远来看，则比生产投资更为重要，更为有效。因为教育投资，不象工业生产，投资以后立刻可以产生物质财富，立刻可以增加上缴利润或税收；反之，它是通过培训和输送有较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劳动大军而实现的，这就是说，教育的经济效果是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实现的。一般的说，教育获得经济效果的周期比较长，据计算，培养一代具有中等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劳动者需要12年左右，培养高级科技人才需要16年左右；但是一旦培养出来之后，它的经济效果，比单纯地增加生产设备和劳动力数量要超过若干倍。就是说，相同的费用，用于提高劳动者的质量，比之单纯增加设备或增加劳动者的数量，更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一旦有所提高，则社会财富可以成倍地增长。

正因为教育投资是比之于其他工农业投资更为有效，更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投资，所以各国有识之士，都把这项投资作为智力开发的投资，各国政府也无不十分重视这项投资。这几年来，我们党中央和国务院也很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在国家财政仍有困难的情况下，教育经费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逐年有所增加。例如1981年的教育事业费支出比1976年增长102.7%，平均每年递增15.2%，而同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只增加29.3%，平均每年递增5.3%，即教育事业经费的增长大大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再从教育事业经费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重看，1979年占6%，1980年占7.8%，1981年占10.2%，1982年占10%，1983年比1982年绝对数虽有所增加，在预算中的百分比反而少了，还不到10%，仅占9.75%。在国家财政还有困难的情况下，教育经费还有相当的增长，这充分说明党和政府对教育事业的重视。

但是，这是不是已经做够了呢？还远远地不够。这可以从两方面看，第一是它还不能适应四化的需要；第二是与世界各国相比较。首先我们要在1990年以前争取基本实现初等教育的普及，

必须采取具体措施。具体措施之一就是要实行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就是一种强迫教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把“初等教育”视为“强迫教育”,强迫教育期从5年到12年,各国不尽相同)这种教育,对儿童来说,是一种权利;对父母来说,则是对子女和国家应尽的一种义务,是一种法律的强制。日本明治政府明确规定,普及义务教育同纳税和服兵役一样,是公民向国家应尽的三大义务之一。英国法律规定,父母如不送子女完成义务教育,要受法律的制裁。日本、西德对不送子女上学的父母和在上课时间雇用学龄儿童的企业主,都要处以罚金。但要实行义务教育,则必须对实施义务教育的儿童全部免费。因为既称义务教育,即不能收学费,否则父母可以借口交不起学费而不送儿童入学。各国不但对义务教育全部免费,而且许多国家还免费供应课本、点心,如英国免费供应午餐和牛奶,朝鲜发给儿童校服等。但我国直到今天,还没有把义务教育提到议事日程上。我国无论公办小学或民办小学,学生都是要交费的,尤其是民办小学,由社队或企业自筹经费,根本不是义务教育。要实现义务教育,就必须把全部民办小学改为公办小学,把所有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这就需要一大笔经费。假定我国民办中小学教师以500万人计,每一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后每年需增加工资300元,则全国约需15亿元左右。再加以实施义务教育后修建校舍、增加设备等等开支,如每县以100万元计,则全国2000个县约需经费20亿元。这两项合计就需要35亿元。目前我国教育事业经费支出每年约为100多亿元,如加上这35亿,则为一百三四十亿元,占国家支出总数的14%左右。这一比例是不是太高呢?这里,我们可以与各国比较一下。

按世界各国教育经费所占国民收入及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例,没有一个国家不比我国高。例如以教育经费所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来说,美国1970年占7.2%,1977年占7%;苏联1970年

占 8.6%，1977 年占 8.7%；日本 1970 年占 4.7%，1978 年占 7.1%；西德 1970 年占 4.7%，1976 年占 6%；南斯拉夫 1970 年占 6.1%。以上这几个国家，美苏代表第一世界，日本、西德代表第二世界，南斯拉夫代表第三世界。他们的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收入都在 6% 以上，高的达 8—9%。而我国据国家统计局《1981 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结果的公报》（1982 年 4 月 29 日公布）1981 年的国民收入初步计算为 3880 亿元，而我国这一年的教育经费仅 100 亿元有奇，即占国民收入的 2.6% 左右，这不能不说是特别低的。即使我们的教育经费比现在增加一倍，即增加为 200 亿元，也不过占收入 5.2%，还不到上述各国一般平均数的 6%。

再以教育事业经费在国家支出中所占的比例来说，日本 1979 年教育经费占国家总支出的 20.2%，美国 1978 年占 15.3%，英国 1979 年占 13.4%，法国 1978 年占 16.9%，苏联 1978 年占 14.2%，西德 1977 年占 14.9%，印度 1969 年占 20.8%，南斯拉夫 1970 年占 16.1%，而我国 1981 年只占 10.2%，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按照上面的计算，把全部民办教师改为公办教师，再每个县每年增加 100 万元的教育经费，加上现有的教育经费，三项合起来亦不到国家支出比例的 14%，还是远远低于上述各国的平均数（15—20%）。

有人说，我国教育经费少，教育不发达，是由于我们国家穷，底子薄。这话初听起来，好似很有道理，但细加分析，便知道这是不能说服人的。国家穷、底子薄，只能说明我国教育经费的绝对数不能和别的发达国家相比，而不能说明我国教育经费的相对数（即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国家预算中所占的比例）也要比别的国家特别低。实际是我们不但比第一世界与第二世界等发达国家低，也比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低。（在联合国统计中，第一、第二世界称“发达国家”，第三世界称“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南斯拉夫、埃及等国都比我国高得多；而且不是“稍高于”，而是